

[书评]

权力织就出的千年精神枷锁：一部关于传统政治迷信和古代皇权驯化手段的祛魅书写

评王子今：《权力的黑光：中国传统政治迷信批判》

JokingKong · 2026-07-23 18:15

「对先祖所创立的政治成规的盲目迷信，正是作为政治伦理规范的“孝”的真髓。依靠这种迷信所维持的政治权力，其成就的最理想的极点，也不过只是守护旧业。层层重裹的宗法迷信的浓雾，千百年来长期封锁着原本有希望在政治形态方面革故创新的民族智慧的光辉。」

大约十几年前，年轻人聚在一起，若是不聊两句水逆或是处女座的强迫症，仿佛就拿到了现代社交的绝交书(至今仍有星座迷残余)。当时人们总觉得这种把个人运势挂在星星上的举动是当代人的精神自嗨，但在倒退两千年的地界上，观星和预测天气可是一门极为严肃的、甚至掉脑袋的政治技术。那时候如果天上掉下一块陨石，或者关中大旱了三个月，朝廷里的太史令绝不敢像今天的星座博主那样敷衍一句“近期诸事不顺”，而是得诚惶诚恐地把这账算在皇帝的德行上。有趣的是，这种看似荒诞的天人感应，在漫长的历史里不仅没有让统治者感到尴尬，反而被他们顺水推舟地办成了最高级的股份制神学公司。

王子今先生的经典专题史学著作《权力的黑光：中国传统政治迷信批判》，聊的就是这桩买卖。他以扎实的秦汉史料为底，剥茧抽丝地向我们展示了天命、先祖、清官这些被神圣化的概念，是如何变成一场全民自愿参与的精神驯化。

读完此书的感觉就像是在密不透风的古宅里，突然被一只干练、灵动而又不着痕迹的手推开了窗，冷冽的空气裹挟着历史的本真扑面而来。这并非一时的感官刺激，而是一种智识上的彻底省悟，逼着你去审视那些日用而不知的文化惯性。

这部最早于1994年问世、并于2020年再版的学术著作，成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那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反思浪潮之中。那是一个渴望祛魅、呼唤理性的时代，知识界正以极大的勇气对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手术刀式的清算。它不仅是秦汉史专家王子今先生深耕皇权吏治、社会意识的集大成之作，更是一柄直击传统文化深层隐疾的解剖利刃。

王子今先生以马克思“用历史说明迷信”为核心方法论，融合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沉痛批判、弗雷泽的文化人类学视角，以及黑格尔对东方政体的冷峻剖析，层层剥茧，勾勒出一幅传统政治文化

的祛魅图卷。这种批判是深邃的、严密的、干净的，它不带个人恩怨的宣泄，却字字见血，直指那个笼罩在华夏上空两千年的庞大怪兽。正如他在导言中所说：

「中国传统政治心理中对于天命的迷信、对于先祖的迷信、对于圣贤的迷信、对于长老的迷信、对于功臣的迷信、对于清官的迷信以及对等级制政体的无条件服从、对于“大一统”政治模式的盲目尊崇等，都是有利于专制统治的政治迷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最高统治者所百般推崇的最集中地体现中国政治迷信的“忠”这一政治道德准则，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政治生活。」

这段话几乎是全书的鸟瞰图。在王子今的笔下，那些长久以来笼罩在华夏文明上空的神圣光环——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天命，还是温情脉脉的祖先，亦或是被奉为万世师表的圣贤，在经过政治权力的刻意伪饰与一代代智学之士的巧妙装点后，都异化为了驯化民众、消解个体能动性的精致工具。中国古代的专制政治高明就高明在这里，它不屑于总是扮演赤裸裸的暴君，而是更倾向于穿上儒雅的儒服，在钟鸣鼎盛与礼乐教化中，让臣民心甘情愿地交出膝盖。

然而，作为当代的读者，在折服于作者扎实治学功底的同时，也不免带着审视的目光去打量这部作品的时代底色。必须承认，受制于三十年前的成书背景，本书完整地沿用了上一代学界通行的马列阶级史观，这使得它在宏观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着典型的时代局限。在那个学术范式相对单一的年代，学者们习惯于用统一的阶级分析法来涵盖一切历史现象，这种宏大却粗线条的归纳，有时难免会遮蔽历史机制内部的错综复杂与动态演变。

最显而易见的体现，便是全书将秦代至明清两千余年的大一统王朝，一律笼统地概括为“封建专制”。这一概念在当下的新史学研究中早已被修正。现代学界普遍倾向于严格区分西周时期的分封式“封建”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体制，并提出了“秦制”、“王权主义”或“官家主义”等更为精准的全新界定。这种概念的厘清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是为了更准确地捕捉传统权力结构的演变轨迹。

毕竟，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对应的是分权的领主体系，贵族阶层之间存在着契约与人身的相对独立；而秦汉之后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王朝，则是皇帝一人独尊、官僚阶层层层跪拜的垂直结构，这与分封制在制度逻辑上存在着本质的分野。书中这种将两千年等量齐观的“封建”提法，无疑是旧有史观遗留下的固有局限，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秦以后郡县制官僚帝国独特压迫机制的微观剖析。

不仅如此，作者在第一章中论及思想史中的反权威支流时，认为从墨子到明清之际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的“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标志着反权威思想发展到了否定君权本身的高度，并由此孕育出了民主思想的雏形。这种论断在今天看来，恐怕是有些

一厢情愿的隔代附会了。我们总是太渴望在古人那里找到现代文明的根苗，以至于常常模糊了历史的边界。

晚明黄宗羲等遗民群体在经历天崩地裂的甲申国难后，所苦心孤诣构建的，本质上依然是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希望通过复古三代、虚君设相来修正全面失控的皇权，而非现代意义上基于主权在民、社会契约精神的民主萌芽。他们渴望的是一个懂得克制、垂拱而治的圣君，而非一个彻底消解君权的公民社会。他们从未跳出圣王治世的想象框架，将其视作民主的先声，未免拔高了传统内部的自我更新能力，也低估了秦制那强大的自我修复与吞噬能力。

可是，奇妙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历史往往喜欢开一些黑色幽默式的玩笑，精巧的理论框架有时会沦为干瘪的教条，而看似陈旧的工具在真正的大师手里却能雕刻出惊世的杰作。即便史观框架带有如此鲜明的时代烙印，即便在某些历史节点的定性上存在可以商榷的偏颇，但当人们真正沉浸到《权力的黑光》那细密、严谨的文本之中时，却无法否认它是一部极其优质的专题史学成果。这是一种奇特的阅读体验——它竟然成为了少数能让人完全接纳旧史观体系的史学作品。

全书放弃了编年体的流水账写法，而是采取了一种干练、简练、直白而不絮叨的专题概念型架构。全书十四章互为闭环，由文化基底到制度源头，再到各大意识形态支柱，纵横交错，面面俱到，织就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批判之网。在这张网里，没有宏大而空洞的口号，只有冷峻而缜密的考证。在书中，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工具被抛出来，却完全没有很多平庸著作中那种生搬硬套的教条气与大话空话。相反，王子今先生将这些理论精准地缝合进宏大的史料考据之中，逻辑剖析如丝剥茧，说服力极强。

用一句更直白、更有“人味”的话来评价，那就是：“没想到阶级史观可以下出这样的蛋”。这种高质量的产出，完全得益于作者那堪称恐怖的治学功底。他不是在用理论强行裁切历史，而是用如山的铁证让理论获得了血肉。

他从上古神话的重构开始，揭示出泛政治主义如何成为传统文化的全域土壤。在那个人类文明的清晨，羿射九日的神话就已经被悄然转译为了政治隐喻——太阳与君主同构，权力独尊的意识就此深植于民族的集体记忆。在这种全方位渗透的泛政治文化中，行政权力肆无忌惮地侵入到衣食、思想、家族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在剪断脐带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无法逃脱这场宏大的政治规训，生活被单一的政治尺度死死卡住。王子今写得精妙：

「政治权力犹如“兼照天下”的太阳一样，监视着、主宰着一切社会文化现象。气象万千的社会生活都必须用政治尺度加以衡量评判，姹紫嫣红的文化风貌都被强行涂抹上阴暗单调的政治色彩，所有的文化产品都不得不统统打上整齐划一的政治包装，任何一种关于推动文化进步的理想，似乎都只有附系在政治的总纲上，才有实现的可能。这种泛政治主义的文化倾向，最终导致“溥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每一个社会人都由“自然人”沦为“政治人”。于是，政治制度、政治力量对于社会文化的形态和方向表现出规定性的影响。」

这种泛政治主义的直接制度产物，便是祭政合一的古老权力运作模式。上古的圣王往往兼具巫师的身份，大禹的“禹步”、商汤的自焚祷雨，史料斑斑，无一不在证明统治者是如何通过垄断与神灵沟通的渠道，来垄断世俗的法统。在那个科学尚未启蒙的时代，对未知的恐惧是人类最普遍的心理宿疾，而统治者恰恰利用了这一点，将自己包装成天帝在人间的唯一代言人。这种祭政合一的本质，是一场由最高统治者主导的、欺人兼自欺的宏大政治表演。

王子今在分析这种深层心理时，进一步指出：

「实际上，中国由于政治权力兼而代表神权，由于政治权力具有宗法制度的基础，由于政治权力巧妙摆弄圣贤这种政治偶像的特殊技艺，特别是由于政治权力对于零落分散的小农经济单位兼行生产组织规划的功能，政治迷信——也就是“对国家的迷信”、“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务的崇拜”更突出。这种迷信更广泛地深入到民众的“一般意识中”，植根也更为深固。政治迷信，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

这种特质，直接导致了政治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并最终通过繁复的祭祀礼制将尊卑秩序永久地固化了下来：

「祭政合一的制度当然对于文化史的进程有或许积极或许消极的影响，然而对于政治权力的直接作用，一般来说，都促进了其高度强化，有助于政治迷信的形成，从而推动了最高权力者政治事业的成功。祭祀权力的专有，证明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在确立了泛政治主义的文化基底与祭政合一的制度源头之后，《权力的黑光》将批判的锋芒转向了支撑传统意识形态的三大支柱：天命、先祖与圣贤。这三者构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从天道、血缘到道德，将个体的精神世界合围得水泄不通。

首先是天命迷信。这套由殷商绝对天命演变到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灾异神学体系，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套制衡君权的机制——水旱日食皆是天帝对君主失德的警告，帝王需要罪己，三公需要策免。但王莽的篡位案例无情地撕开了这层自省的虚伪外壳。天意的解释权永远垄断在统治阶层手中，所谓的约束最终都流于形式化的政治作秀。即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如王安石、张居正，也终究无法跳出天变之讖的桎梏。民间对于天道不公的叹息，也往往演变成静待天罚的消极隐忍，从而彻底消解了主动作业的政治能动性。对此，王子今有极为清醒的论述：

「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古国来说，影响农作物收成的天灾无疑是对政治权力的巨大威胁。中国古代，天灾从来都被解释为天意，是天帝对当权者的警告或惩罚而被赋予政治意义……处理好天人关系，成为历代统治者必须尊行的政治原则。对天帝的意向，政治家必须小心翼翼地察

言观色，细心揣摩。」

比天命更具有肉身温度、因而也更具粘性的，是先祖迷信。西周创造性地将宗法制度与政治等级结合在一起，构建了“家国同构”的逻辑闭环。通过大宗小宗的血缘谱系，王朝的统治者成功地将政治上的服从转化为家庭内部的伦理本能。而作为先祖迷信向政治服从转化的核心中介，便是“孝”。通过察举孝廉、十恶立法，孝道被国家暴力强制推行，其内核被悄然替换成了对既定秩序的盲目服从与对陈规的亦步亦趋。

这种尊古卑今的保守心理，在漫长的小农经济土壤中获得了几乎永恒的生命力。封闭、狭隘的生产方式让经验成为了最核心的资产，而据有经验优势的长者与先祖自然被神圣化。它不仅成为了制度创新的核心阻力，甚至逼得所有历史上的革新者，都不得不采取“托古改制”这种近乎悲剧性的迂回战术，用死人的名义来为活人的事业开路。正如王子今所说：

「对先祖所创立的政治成规的盲目迷信，正是作为政治伦理规范的“孝”的真髓。依靠这种迷信所维持的政治权力，其成就的最理想的极点，也不过只是守护旧业。层层重裹的宗法迷信的浓雾，千百年来长期封锁着原本有希望在政治形态方面革故创新的民族智慧的光辉。」

至于那高高在上的圣贤偶像，则不过是专制权力最精致的道德包装。尧舜禹汤的完美人格被层层累加，成为了士人修身从政的统一模板。然而这种神性的拔高，最终带来的却是自然人性的消泯，造就出了一代代面孔阴冷、缺乏活力的政治“非人”。这些“非人”满口仁义道德，内心却早已在日复一日的规训中干枯变形。更反讽的是，圣贤的德行往往成为野心家最好的垫脚石，王莽在篡位前对圣贤形制的完美模仿，便是对这套崇拜体系最大的黑色幽默。孔子被奉为“素王”，恰恰证明了精神权威在面对世俗暴虐时那无可奈何的臣服与依附。历史在这里展现出了它最残酷的一面：道统看似崇高，但在政统的隆隆战车面前，终究不过是一抹随时可以被抹去的粉饰。

如果说全书的前半部分是在对这些宏大的意识形态神话进行定点清除，那么在书的后半部分，王子今先生则展现了更具洞察力的空间与时间剖析。他开始深入到帝国运转的毛细血管中，去观察那些冰冷的权力技术是如何在官僚、功臣、乃至清官的互动中落地的。

他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具体的制度物理载体。官僚等级制通过繁复的避讳、严苛的诉讼尊卑，在民间乃至官僚内部建立起“畏官如虎”的权力金字塔；而盲目神圣化的“大一统”政治观，则在思想上强求绝对的一致。这种一元化的政治追求，其目的无非是让人君的“正心”成为全天下的唯一标准。作者在这里体现出了卓越的辩证目光，他无情地打破了“统一等于进步、集权等于富强”的单向迷思，以秦隋的迅速败亡与汉武集权后的经济凋敝为例，证明强令舆论一律、排斥多元可能的迷信，终将成为社会演进的巨大枷锁。

同样遭到解构的，还有农业文明中根深蒂固的“老年政治”。经验的垄断转化为政治资本的垄断，“老成谋国”的迷信导致了政治形态的守旧与僵化，让朝堂变成了暮气沉沉的停尸房。而那些作为体制安慰剂的“清官迷信”，则被作者一针见血地指为底层民众政治无能的产物。在“青天大老爷”的跪叩与企盼中，民众真诚地交出了公众应有的最后决定权，用一种温良的顺从强化了专制制度的心理根基。这种奴性心理，恰恰构成了黑光得以长久笼罩的幽暗基础。清官越是高大，反衬出底层的平民越是渺小与无力。

在这个过程中，士人阶层所谓的“独立精神”也在这套庞大的政教网络中被消磨殆尽。他们曾试图以“道”尊于“势”，但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这种坚持往往显得不堪一击。正如王子今在分析政统与道统的权力博弈时所说：

「将儒学的原则应用于政治实践，尽管有时出现实用主义及庸俗化的倾向，如董仲舒所谓“春秋决狱”，然而这种努力却表露出要将“政统”与“道统”结合为一的真诚意愿。在科举制形成之后，经学的水平与政治的能力也被等同看待，研习儒学的士人大批地充实到政权机构中。然而，自以为真正代表着“道统”的知识界人士都早已有独立于政权的传统，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孟子还提出不能“枉‘道’而从彼”，即不允许“道统”屈从于“政统”的主张。」

他又补充道：

「他们还往往结成集团，推举自己的精神领袖，并且频繁地指责帝王“失德”、“离经”，背离了真正的“道统”。“政统”需要“道统”的支持，帮决不能容忍“道统”对行政的干扰，因此总是采用严厉的专制手段打碎这种企图。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最突出的例证。历史的总趋势似乎总是表现出“势”长“道”消的倾向。实际上最终总是导致“政统”压倒“道统”，政治权力愈大，则愈可以证明自己是“道统”的真正代表的历史结局。」

这种控制的最高阶段，莫过于将人间的专制秩序完全投影到精神世界，连彼岸的灵魂安息之地也被强行贴上了帝国的封条。在书的最后几章，作者向我们展示了神界等级是如何一板一眼地复刻了人间的权力结构：至上神从天、上帝最终定型为玉皇大帝，其名号的演变与人间皇权的强化完全同步；而紫微、太微的天文命名，更是把朝廷中枢搬上了星空。天上的星辰不再是自由闪烁的光芒，而是变成了公卿百官的投影，连神仙也要按品阶排班。

在这个被权力深度驯化的神界里，连神仙的命运也必须遵循专制的逻辑。关羽因符合统治者的政治教化而被一路册封，从一个民间勇烈之士被生生抬高为与文圣并列的武圣，其背后无非是专制强化对“忠义”道德偶像的刻意树立。而共工、蚩尤、乃至孙悟空等具有叛逆色彩的神话形象，最终的结局无一例外是“反抗—失败—归顺”。那顶戴在美猴王头上的紧箍咒，成为了政治迷信

最完美的精神隐喻——它不再需要外部的暴力鞭笞，而是转化为了内在的思想自觉，让被统治者在自我规训中走向服从。这种从肉体到灵魂的全面合围，正是权力黑光最令人感到恐怖与窒息的地方。

这就是《权力的黑光》所揭示的沉重现实。它让我们看到，政治迷信在本质上是反理性的，是虚妄而且脱离历史真实的。中国古代的政治迷信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历史惯性，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总结的那样，不仅是因为千千万万个体小农户共同托举着专制主义的神圣君权，更是因为这种迷信在长期的刻意伪饰下，表现出了一种平和、新巧而又文雅的特征，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征服人心，产生掩盖政治暴力与罪恶的久远效用。这种文雅的外壳，让多少文人墨客在其中沉醉不醒，甚至将这种奴化美化作为一种独特的东方智慧。

合上书卷，书中所展现的考据跨度与思想深度令人叹服。尽管作者的分析框架中留有三十年前学术范式的陈旧痕迹，但他所提出的核心命题——政治迷信与民主理性的绝对互斥，至今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关怀。

历史并没有真正走远，那些古老的观念幽灵依然在现代社会的某些角落里徘徊。唯有通过理性的祛魅，拆解那千年以来深植于民族精神深处的盲从惯性，将每一个个体从权力的全能神话中剥离出来，政治文明的真正进步才有可能发生。那束照彻历史幽暗的冷冽之思，正是我们今天走出传统迷雾、走向真正独立与清明时，必不可少的一剂清醒剂。



扫码进原文:

<https://ximutan.com/forum/post/38>

以书会友，谈论天下

© 西木读书论坛